

孙中山称赞的陕西民主革命家

——辛亥革命时期的井勿幕

· 张 应 超 ·

井勿幕是辛亥革命时期陕西资产阶级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做的出色成绩，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称他为“后起之秀”①、“西北革命巨柱”②。黄兴、吴玉章、熊克武、张翼若等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也都深为赞许。过去学术界对井勿幕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研究探讨甚少，为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走上革命道路

井勿幕，字文渊，1888年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家庭。《辛丑条约》签订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他的家庭也每况愈下，亲身经历使少年时代的井勿幕就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深为不满，他“纵论天下大势，对于清政多所斥议”③。1902年，他赖以生存的“义源永”杂货店破产，为了摆脱债务，继续求学，他只好去四川依附父亲的朋友、川东道张铎。在四川读书期间，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接触到一些介绍国外资本主义的书籍，眼界更加开阔。当他知道四川有学生出国留学的消息

后，便不顾张铎的反对，在1903年冬“以数金冒险从蜀人士赴日本”④，入东京大成中学读书，成为陕西最早的留日学生。

刚踏入青年时代的井勿幕深切怀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亲笔写了一付“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⑤的对联挂在案头。他在另一首《孤愤词》中写道：“大丈夫生当斯世，宜效死疆场，为民族存正气。否亦当轰轰烈烈，如荆卿剑、博浪椎诸伟举。事无成败，亦已寒祖龙之胆，壮山河之色，为祖先留生气，为民族续命脉。安肯他他伉俪、忍辱事仇，俯首异族统治之下哉！”⑥这些文字表达了一个爱国青年忧国忧民，要为反清斗争献身的强烈愿望。

1905年秋，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井勿幕立即加入。不久，即主动请求孙中山派他回陕创建同盟会组织，从事反清斗争。当时的陕西“风气闭塞，交通阻梗，言械则接济为艰，筹饷更呼吁无门；又值党禁方密，人皆危言危行”⑦。在这样的条件下领导反清斗争，确实困难重重。所以，孙中山尽管很想在西北点燃革命火种，却担心这个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不能担负这样的重任。但井勿幕以他满腔热忱、誓死不渝的决心和

为威武将军，督理陕省军务，而张被授以扬武将军调北京将军府（《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25页）。张凤翔依附袁世凯的结果，葬送了革命，自己也没有得到好处，使袁世凯北洋政府直接控制了陕西。至此，陕西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陕西辛亥革命的经过和失败，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无法避免其失败的结局。事实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1页）。

对陕西情况的详尽分析,使中山先生打消了顾虑,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委任他为同盟会陕西支部长。1905年冬,井勿幕带着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重要使命,踏上了新的征途。井勿幕从他参加反清革命开始,就心悦诚服地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指导,并在实践中增长自己的才干,这是他辛亥革命时期活动的一显著特点。“时民党多少学子,勿幕独归”^⑧。井勿幕不怕牺牲、敢闯虎穴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开创了陕西留学生回国参加反清斗争的先例。

创建和领导陕西同盟会组织

井勿幕回到陕西以后,奔走于西安及渭北各县,半年左右就发展同盟会会员三十余人,创建了同盟会陕西支部。这是陕西人民反帝反清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陕西人民进行反清斗争的开始,使陕西人民的反清斗争走上了新阶段。从此,陕西的知识界、军界、刀客、会党中的进步力量“统一组织,然后众流汇合,群情一致。各地青年志士,复风起云从,如春草之怒茁,如初潮之涌动”^⑨。扭转了过去斗争的被动局面。

井勿幕的活动能力很强,他“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新学’,也能和中年的秀才举人们做诗谈旧学”。“对于所谓‘十八般武艺’也都会耍,所以更能和江湖上的人结交”^⑩。他知人善任,经他介绍加入同盟会的人,基本上都是同盟的骨干。他的这些优点,对陕西同盟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07年10月,井勿幕参加并领导了在陕西辛亥革命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祭黄陵活动(从前陕西出版的有关史料均把祭黄陵时间误推为1908年10月,准确地推算应为1907年10月,考订情况笔者另有专述)。在祭文中,革命党人明确表示,要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为榜样,庄严宣布“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⑪。

由于井勿幕和同盟会其他骨干的努力,革命力量在陕西迅速发展,陕西当局常恐慌,千方百计对其进行镇压,1908年10爆发的轰动一时的“蒲案”,就是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一次公开

较量。斗争的结果,同盟会组织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日见壮大。同年冬,在井勿幕的亲自主持下,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鉴于他奔走各地,四处联络,行踪不定的实际情况,没有担任会长,但在陕西会员的心目中,仍以“勿幕其领袖”^⑫。1910年春,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在陕西泾阳召集同盟会陕西分会骨干和会党首领开会,调整领导成员,决定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以适应斗争需要。会后,各县“纷纷成立分会,扩张势力,会员逾千”^⑬。

1910年秋,井勿幕和熊克武等人赴香港,协助黄兴筹划广州起义,不久即回陕西。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井勿幕的活动进入了最紧张的时期。广州起义爆发时,他“由陕赴之不及,故得免于难”^⑭。起义失败后,他返回陕西,召集同盟会骨干开会,传达总部指示,要求陕西会员立即行动起来,准备起义,“冀收南北呼应之效”^⑮。会后的几个月中,井勿幕冒着危险,奔波于西安及渭北各县,根据复杂多变的情况,数次修改起义计划,并说服会党与同盟会会员采取统一行动。

井勿幕不仅是同盟会陕西支部的创始人,而且是设在日本的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06年夏,井勿幕二次赴日本,着手筹建陕西分会,由于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极力破坏和阻挠同盟会在日本的活动,陕西的留日学生又有“咸长派”和“渭北派”之分,不能很好团结,加上井勿幕早年离陕入川,陕西学生对他不够了解,“多以其年轻,不肯与之深谈,更何可倡言革命”^⑯。井勿幕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先和热心同盟会工作而又和两派学生都能联系的陕西省学生赵世钰结成密友,“每见必谈革命事”;然后,“接洽外省同志”,“遍访本官、私费学生联络感情”^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乃于1906年秋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从此,陕西留日学生在分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国内人民的反帝反清斗争,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陕西革命党人的活动遥相呼应,对陕西的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1906年到1908年的几年中,同盟会在国内组织的多次起义均遭失败,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孙中山、黄兴等重要领导成

员又下常在日本,致使同盟会总部出现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⑮的严重局面。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井勿幕、吴玉章等人经常联系,支撑着同盟会总部的工作。

联合和组织武装力量

资产阶级能不能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是能否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问题。井勿幕在陕西活动的初期,就对这一点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革命不联合军事力量,单靠鼓吹宣传,终无成功之理”^⑯。因此,十分重视联合武装力量,并且下了很大功夫。

辛亥革命前陕西的武装力量中,有可能联合参加反清斗争的,主要有会党、刀客和新军,其中以会党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尽管会党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有突出的优点:一、对清朝反动统治不满,党徒遍布陕西^⑰。二、能英勇奋斗。三、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形式。这就使同盟会和会党联合有了可能。

早在1906年春同盟会陕西支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井勿幕就提出了联合会党的问题,但因会员大多对会党缺乏全面认识,“深恶会党中人之行为,不屑与为伍”^⑱,坚决反对井勿幕的正确意见。为了实现同盟会与会党的联合,井勿幕一方面用孙中山、黄兴重视联合会党扩大革命势力的事实,向同盟会会员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一方面向会党展开争取工作。他通过种种关系,结识了会党首领吴虚白、唐和尚等人,请他们列席同盟会的重要会议,同时亲自加入哥老会^⑲;又和新军中最有实力的会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人交朋友,“发挥同盟会旨,鼓舞其精神,开通其知识,联络其感情”^⑳。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08年冬同盟会陕西支部改为陕西分会的大会上,通过了联合会党、刀客、新军的决议^㉑。同盟会和会党的联合日益扩大。191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三),以井勿幕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和新军中的会党首领在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㉒。1911年春,井勿幕、胡景翼等领导人和会党首领“复盟于雁塔寺”^㉓。同盟会和会党的联合行动,使陕西起义迅速成功并击败了清军东、西两路夹攻。郭希仁说:“陕西光复,革党和

会党联合之力”^㉔,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

刀客是陕西特有的一种武装力量,其势力逊于会党,组织也不如会党严密,集团之间划地自封、还常因意气之争互相残杀^㉕,因而容易被反动势力利用。但他们也来自社会的底层,多次受到清政府镇压,和官府矛盾尖锐,特别是还“流行着所谓‘拿命帮’的侠义精神”^㉖。如果对其引导得法,也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力量。井勿幕非常注意联合刀客,在陕西地区发展的首批同盟会会员中,就有刀客参加;他还和胡景翼、李仲三等同盟会的骨干,在刀客中宣传同盟会的宗旨,开示其途辙,化除其私见”^㉗。使刀客成为井勿幕部下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陕西的新军创建于1904年。1909年扩编为混成协。新军营、连级军官中青年知识分子占相当数量,士兵中哥老会员占半数以上^㉘,这些人比较容易接受同盟会的革命思想。井勿幕创建同盟会陕西支部即开始在新军中活动,当时在隶属于新军的武备学堂肄业的彭仲翔就“以军人首与其谋”^㉙加入了同盟会,但由于清政府对新军严密控制,活动不易开展。1910年春,同盟会会员钱鼎、张伯英等由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回陕,充任新军下级军官,钱鼎是一个和“井勿幕有不少相似之处”^㉚的革命派重要人物,又兼会党身份,便于在新军中活动。井勿幕“倚定三(钱鼎,字定三——引者)为左右手”^㉛,二人密切配合,使新军中的革命工作迅速开展,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新军也起了重要作用。

井勿幕在联合会党、刀客、新军的同时,也注意到同盟会的武装。1906年春,他带领同盟会骨干赴耀州、宜君、中部(黄陵)等地勘察,从1908年起,在井勿幕的指导和参加下,同盟会会员先后在这一带办起牧羊场、模范村和小铁矿,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据点,制造炸弹,喂养战马,进行起义准备。这些活动在辛亥革命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西安起义后,在西路战役中威震敌胆的炸弹队使用的炸弹,就是辛亥革命前在这些据点中试制成功的^㉜。

创办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907年8月,陕西、甘肃两省留日学生在东

京创办《秦陇报》杂志,支持国内人民的反帝反清斗争。因为缺乏经验,编辑用人不当;加上内部不够团结、经费困难等原因,仅出一期即停刊。接着,井勿幕、邹子良、周世钰等同盟会员“联络同志另行组织”^{③⑥},1908年2月创刊《夏声》杂志。井勿幕在《夏声》杂志上以“侠魔”为笔名发表文章多篇,这些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我国的罪行。井勿幕清醒地看到,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祸迫燃眉,亟亟不可终日”^{③⑦}的严重局面。他分析了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手段:一方面“中国之一丘一山,皆在外人任意要求之权利中”^{③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高声叫嚷“保全中国独立”^{③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祸心包藏,危机隐伏;阳予保守和平之名,阴施其侵略之实”^{④⑩}。他大声疾呼:“吾民之被人欺侮如此,……当自猛醒,勿再为人所愚”^{④⑪}。这些文字,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不满。

二、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对人民的黑暗统治。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敢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呢?井勿幕指出,完全是因为“政府之懦弱,外人得以无理要挟”^{④⑫}。他析说,清王朝“以民命为鱼肉,牺牲国权国耻而不顾”^{④⑬},无耻地和帝国主义勾结。于是,“外人借政府为傀儡,政府又借外人为护符,相结为奸,以害我民”^{④⑭},把清政府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可憎面目揭露无遗。他对清政府的封建黑暗统治进行了有力的鞭挞。他写道,皇室贵族“政演王权,治尚专制,荼毒生灵,惨无天日”^{④⑮},各级官吏“相彼豺狼,飞食生人;强聚巨蠹,为害里闾,相沿成俗,千载故如一日也,而今倍之”^{④⑯}。他在《夺饥民口中食者谁乎》一文中,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甘肃大旱三年,“官场匿灾不报,而苛征依然”^{④⑰}。上海各界人士组成筹赈公所,募得赈款十余万银。清政府不仅对灾民见死不救,反而给筹赈公所派到甘肃调查灾情的义赈员加以“革命党”罪名,进行迫害;又把在上海组织义赈的于右任关入监牢;甘肃的反动官僚则把上海筹赈公所汇去的救灾款大肆贪污。他愤怒地写道,在这样的国家中,“所谓社会之公安何在?人民之幸福又奚存也?”^{④⑱}这些文章有理有

据,很有说服力。

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井勿幕满腔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很赞成“二十世纪无专制国之立足地点”^{④⑲}的说法,他诅咒那些“威横施雄”的暴君,都应得到“血灌通衢”的惩罚^{④⑳}。他认为“吾国专制之毒,祸入已深”,非惟不能望自由制度津涯,即所谓专制者,亦属极端之野蛮专制政体”^{④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欧美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在这些国家中,“铁道大王、煤油大王之富豪威称海宇,纵情极欲。而大多数之贫民,无职无资,日夜奔走衣食,且不能脱卑屈奴隶之境遇”^{④㉒}。他以“期免重陷社会多数人之牛马卑屈之境”为目的,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平民主义”、“共同产业生活主义”、“社会经济主义”^{④㉓}的主张。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思想的烙印。

四、介绍国外的新思潮。在题为《二十世纪之新思潮》的连载长文中,井勿幕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说作了介绍,这是迄今所见的在陕西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最早文献^{④㉔}。

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以井勿幕为首的陕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过近六年的艰苦奋斗,在会党和新军的有力协助下,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一举成功。继武昌起义之后,陕西革命的迅速爆发,牵制了大量清军,减轻了湖北革命军的压力,开创了北方各省起义的先例,“撼中坚而震全局”^{④㉕},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西安起义后,井勿幕立即在渭北组织军队十余营,并率领这支部队“援河东,战土桥,解咸阳之危,应省垣之急”^{④㉖},为陕西、山西革命做出了贡献。在戎马倥偬之际,他仍十分重视军纪,要求部下做到“纪律严明,闾阎无惊”^{④㉗}。因此,各部义军“皆以勿幕为纲纪”^{④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委任他为中央稽勋局副局长,他考虑当时陕西战事正在紧急关头,毅然放弃了去南京做官的机会,留在陕西和清军浴血奋战。

辛亥革命后,随着国内革命党人的迅速分

化,陕西也分化了。袁世凯窃国后,张凤翔向袁氏妥协,对井勿幕“百计梗阻”^{⑤⑥},遣散其部队,打击其力量。1912年春,陕西军队奉命整编,陈树藩被任命为旅长,而陕西革命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井勿幕却被任命为团长,数月之后,被迫离开陕西。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井勿幕虽在南方组织反袁斗争,终因势单力薄,未能起到大的作用。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井勿幕赴云南参加了蔡锷领导的护国反袁斗争。以后,又领导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直至1918年在陕西兴平遇刺牺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的”这一诺言。

井勿幕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但由于受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一、在推翻清朝统治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井勿幕既不同意空想社会主义(他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也列入空想社会主义之中)和无政府主义,也反对欧美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而他提出的人人“输资兴业”,以谋社会平等、国家富强的建国设想^⑥,即“平民主义”、“共同产业生活主义”和“社会经济主义”,也是不能实现的。

二、辛亥革命前井勿幕在陕西的活动,基本上只局限在知识分子和一些现成的武装力量中,没有真正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他虽饱尝了孤军奋战的苦恼,也有过“与一般工农人联络”^⑥的设想,但当扶风、渭南、大荔、富平、米脂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农民反抗官府的斗争后,井勿幕却没有及时组织力量,支持和领导这些斗争。

三、辛亥革命时期,井勿幕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完全掌握的军队。他把刀客武装作为依靠力量,却没有从根本上对其加以改造,后来被怀有个人野心的陈树藩拉走大批力量。辛亥革命前他对会党武装的联合只是为了利用其力量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辛亥革命后,他和右派势力站在一起,打击会党^⑥。既失去了会党这个强有力的同盟军,自己又没有军队,自然无力和手中掌握着军权的右派势力抗衡,只好妥协退让。“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⑥。井勿幕在陕西也正是这样。

四、革命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大问题,井勿幕对此重大问题认识不足,处理失策,结果使张凤翔担任了陕西军政府的最高领导,因而导致了会党和同盟会的公开分裂。在这个关键时刻,井勿幕不仅没有挺身而出,总揽全局,反而批评拥戴他担任“大都督”的同盟会员是“徒自扰”^⑥。

辛亥革命过去七十年了,这些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我们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已经远远超过井勿幕当年的理想。井勿幕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尽管存在着一些缺点,但他作为一个在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上努力探索的资产阶级左派人物,作为一个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定作为和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是值得后人纪念和研究的。

注 释:

①⑤⑥宋哲元、焦子静等:《井先生纪念碑铭》(拓片存陕西省博物馆)。

②③⑬⑭⑮李贻燕:《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井勿幕公葬纪念册》,1945年版。

④⑭《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君勿幕事略》,《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1949年版,第67页。

⑤《井勿幕公葬纪念册》,1945年版。

⑥《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版,第7页。

⑦⑫⑲⑳㉑王儒卿、刘依仁等编:《陕西乡贤事略》,1936年版,第161—162页,第166页。

⑧⑳㉒章太炎:《井勿幕墓志铭》。《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1949年版,第185页。

⑨⑪⑲⑳《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1949年版,第18、28、32、35页。

⑩㉓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63年版,第189、201页。

⑬高又明:《柏筱余先生纪念碑》,《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第165页。

⑭⑰⑲赵世钰(其襄):《井勿幕在东京筹组同盟会陕西分会的经过》,《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1年版,第146—147页,第149页。

⑱《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下转第105页)

地区谋求霸权,同时一再郑重声明,“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颠覆其它国家的超级大国。”中国之所以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坚定不移的一项国策,是因为这一原则不仅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之中,而且反映了我国人民长期遭受霸权主义之害,因而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以及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愿望,这个愿望也正是独立了的发展中国家的愿望。这就是不谋求霸权原则很快得到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支持,而成为调整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重要原因之一。

霸权主义也威胁着西欧、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安全。苏联至今还霸占着日本领土——北方四岛,并且公然在国后、择捉、色丹岛建立军事基地,从而构成对日本和西太平洋的威胁。因而,反对霸权主义也关系到日本和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夺中,苏联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因此,反对苏联的霸权

主义的全球战略也成为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

事情很明显,不谋求霸权、反对霸权主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要求,而且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和人民的要求。世界人民这种反霸斗争的要求已经汇成一股滚滚的历史洪流,势不可挡。不谋求霸权原则就是这样一个适应人心、顺乎潮流的产物。

※ ※ ※ ※

现代国际法不是只有不谋求霸权一个基本原则,而是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国际法准则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综合体系,对其中任何一个法律准则的解释和运用,都必须根据当时的国际实践,并结合其它法律准则来进行。在联合国《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不谋求霸权原则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使国际法上的各项原则更加精确和概括,更易为各国所接受,更易为亿万人民所理解和掌握,从而更有力地发挥着国际法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

(上接第30页)

①⑨郭孟圻:《留日学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革命斗争所起的作用》,(未印稿,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存)。

②⑩郭孝成:《陕西光复记》,《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③⑪高又明:《井勿幕由日本回陕西后的革命活动》,载处同⑩,第153页。

④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北大学历史系合编:《陕西省近代大事记》(初稿),1962年版,第173页。

⑤⑬郭希仁:《从戎纪略》,出处同⑩,第77页。

⑥⑭《关中刀客》,载处同⑩,第113—143页。

⑦⑮童笃生等:《辛亥革命材料》,(未印稿,存处同⑩)。

⑧⑯刘仲德:《彭仲翔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役的经过》,(未印稿,存处同⑩)。

⑨⑰杨子廉:《我所知道的钱定三》,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89页。

⑩⑱宋仁山:《耀州牧羊场的成立经过及停办》,(未印稿,存处同⑩),1962年版,第189页。

⑪⑲⑳侠魔:《二十世纪之新思潮》,载《夏声》第七号,日本东京神田区秀光社1908年版,第1页。

⑫㉑㉒㉓侠魔:《中法最近之交涉》,载《夏声》第六号,第49、48、45页。

⑬㉔㉕侠魔:《日美协约与中国之关系》,载《夏声》第八号,第42页。

⑭㉖《夏声》第九号,第60页。

⑮㉗㉘侠魔:《葡萄牙国王之被刺》,载《夏声》第一号,第83页。

⑯㉙㉚侠魔:《二十世纪之新思潮》,载《夏声》第三号,第19、11、13页。

⑰㉛㉜侠魔:《兴办西北实业要论》,载《夏声》第一号,第15、14页。

⑱㉝冯孝伯:《陕西革命战史序》,(未印稿,存处同⑩)。

⑲㉞井勿幕致常铭卿信(影印件,存处同⑩)。

⑳㉟华孝康:《井案纪实》,1943年版。

㉑㊱《两地书》(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34页。